

解思忠 著

观念枷锁

GUANNIAN JIASUO

种种陈旧
错误的观念
犹如
一副沉重的枷锁
严重阻碍着
国民素质的
提高
和现代化的
进程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观念枷锁

解思忠 著

GUANNIAN JIASUO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责任编辑 陈 军

封面装帧 李树德

观念枷锁

解思忠 著

上海 人民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0.25 插页 2 字数 200,000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50,000

ISBN7—208—02934—2/D·546

定价 18.00 元

前言：观念——国民素质的核心

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已向世人昭示：人的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关键——封闭落后地区的能工巧匠，无论如何也建造不起都市里的高楼大厦。

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还向世人昭示：观念现代化是人的现代化的标志——对于某些富庶之国中开着罗尔斯－罗伊斯高级轿车放牧骆驼的文盲牧人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认为他们自身已现代化。

人的现代化，并不是社会上一度流传的“会电脑、会英语、会开车、会跳舞”那样，仅仅局限于某些现代技能的掌握；也不是在现代化社会的生活经历，或在某一学科的领先地位；更不是“西服、皮鞋、大哥大”或“牛仔裤、披肩发”那样，在物质生活上达到时尚。人的现代化，主要是观念的现代化，即价值尺度、思维方式、行为方式和感情方式等文化心理方面的现代化。

西方学者在研究人的现代化的同时,提出了各种版本的“现代人基本特征”。无论是哪一种版本,都主要着眼于人的观念——它不仅直接支配着人的主要行为,还间接影响着人的其他行为。由于每个国家的现代化过程都带有自身的特点,因而不同国家的现代人基本特征也略有不同。根据各种关于现代人的理论,结合我国的实际,笔者认为,“中国现代人”应具备以下 12 项基本特征:

1. 具有主体意识,不依附于他人或单位。
2. 崇尚民主法制,具有社会责任感,主动参与社会事务。
3. 重视精神生活,自觉地追求美。
4. 思维发散,具有创新精神。
5. 能自省,勇于自我解剖、自我批判、自我超越。
6. 不因循守旧、安于现状,具有进取精神和竞争意识。
7. 眼界开阔,心灵开放,乐于接受新事物,不断补充新知识。
8. 崇尚科学,实事求是,不迷信书本、慑服权威。
9. 具有道德约束力,富于爱心。
10. 具有环境生态意识,能造福后人。
11. 讲求效率,重视技能,具有敬业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。
12. 重视生命质量,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平衡的心理状态。

上述关于“中国现代人”的描述并不是一成不变的,因

为它是一个正在形成着的概念和正在塑造着的形象,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——“中国现代人”的基本特征一直着眼于观念,其演进也一直立足于观念的变革。

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,历史与文化源远流长,未曾发生过中断,这就使得中国具备了一个典型传统社会的品格;中国又是一个有过两千年封建制度的社会,推翻封建制度不到一个世纪,对于封建主义的流毒又一直未能认真肃清;中国,在相当长时间里还经历了极左思潮的浸染和计划经济的主宰。来自于上述传统文化、封建主义、极左思潮和计划经济这四个方面的影响,铸成了国民头脑中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陈旧、错误观念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之所以举步维艰,就是因为国民素质低下;而国民素质低下的主要表现,就是观念陈旧、落后。正如以研究现代化闻名于世的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《人的现代化》一书中所说:“传统人所拥有的品质使他们容忍或安于不良的现状,终身固守在现时所处的地位和境况中而不求变革。那些陈腐过时的、常常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制度就暗暗地靠着这些传统的人格性质,长久顽固地延续下去,死死抓住人们。要冲破这个牢固的束缚,就必须要求人们在精神上变得现代化起来,形成现代的态度、价值观、思想和行为方式,并把这些熔铸在他们的基本人格之中”。

盘踞在我们国民头脑里陈旧、错误的观念,可以说是根深蒂固、盘根错节。它犹如沉重的枷锁束缚住国民的手脚,扼杀着国民的聪明才智,严重阻碍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的进程。人们不仅以这种陈旧、错误的观念自我评价,

自我约束,还以这种陈旧、错误的观念评价他人,约束他人。改革开放以来,在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许多问题和出现的许多失误,无不与来自于这种观念的阻力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。

现代化的蓝图已展现在我们面前。要实现社会现代化,必须首先着眼于国民现代化;而要实现国民现代化,则必须主要着眼于观念现代化。让我们打破陈旧、错误的观念枷锁,以现代人的崭新面目,去迎接现代化的美好明天!

目 录

前言：观念——国民素质的核心 [1]

1. 人民永远是正确的 [1]

2. 资本主义比封建主义更可怕 [17]

3. “左”是认识问题，右是立场问题 [25]

4. “还是五六十年代好” [30]

5. 传统轻易不能丢 [39]

6. 改良比革命好 [51]

7. 关起门来都能过 [59]

8. 外国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圆 [68]

✧ 9. “咱一个草民” [76]

✧ ✧ 10. 既当主子，又当奴才 [85]

11. 当官要为民作主 [97]

12. 拜官主义 [106]

✧ 13. “国家事管他娘” [108]

14. 民主不适合目前的国情	[130]
15. 法治要和人治结合起来	[140]
16. 人情大于王法	[152]
17. 法不责众	[162]
人治 能 ✱ 18. 屈死不告状	[170]
19. “人权问题不要提”	[180]
20. 个性强是缺点	[188]
21. 人随大众不挨骂,羊随大群不挨打	[196]
22. 自我设计是无政府主义和利己主义的表现 ...	[203]
23. 大河有水小河满,大河无水小河干	[210]
24. 有饭大家吃	[220]
25. 人算不如天算	[227]
26. 知足常乐	[234]
27. 精神不如实惠	[243]
28. 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	[251]
29. 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	[258]
30. 重名轻实	[265]
31. 人善人欺,马善人骑	[274]
32. 在家靠父母,出门靠朋友	[281]
✱ 33. 同行冤家	[288]
34. 十鸟在林,不如一鸟在手	[293]
35. 官不修衙,客不修店	[300]
36. 好死不如赖活	[306]
后 记	[314]

1. 人民永远是正确的

开篇论及阻碍国民素质提高和现代化进程的陈旧、错误观念,便将“人民永远是正确的”列为其首,何也?实在是因为,如果我们这些当“人民”的,还是把种种错误都归咎于个别领导人,大家都不作自我反省,那么,以下各篇所要说的就犹如东风过马耳了。

鲁迅积毕生之思索,在临死前曾发出过这样的感叹:“多有只知责人不知反省的人的种族,祸哉祸哉!”可惜,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句话,更没有多少人以此来警策自己。

中国国民的群体反省,在鸦片战争之前是没有过的;鸦片战争之后,才开始从混沌之中意识到自己的落后。五四运动开国民群体反省之先河,对国民性进行了深刻的反省;但这场群体反省很快便被民族矛盾冲淡了,没有能再深入下去、扩展开来,仅仅局限于书斋之中。

共和国成立后,用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来说,就是人民翻

身作了主人；再加之社会舆论的宣传，人民好像陡然之间都变成了另外一个模样。经历过“文化大革命”，熟读过《毛主席语录》的人，一定都还能记得起许多关于“人民”的语录；给人的印象，人民大都是和“英雄”、“伟大”之类的字眼联系在一起。久而久之，我们这些“人民”便自我感觉良好，好像自己永远是正确的。其实，如果鲁迅笔下的阿 Q 还活着的话，共和国成立时，该是年届“知天命”了吧，那脑后的辮子无疑已剃成分头或大背头之类的时髦发式，也许头上的绍兴毡帽还要换成“干部帽”；只要不出什么大的差错，凭着他的革命激情，当个“贫协主席”之类的农村基层干部并不是没有可能的，而且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也绝对是不甘寂寞。但是，我们不妨设想一下，即便是这位“阿 Q 同志”能活到现在，他身上的劣根性又能消除掉多少呢？

1957 年的反右，一下子就抓了 55 万名右派分子；到最后，除了 96 名外，其余的都平了反。如今，提起反右这场对敢于直言的优秀知识分子带来的灾难，往往都把错误归咎于毛泽东；好像这些事都是毛泽东一个人，最多再加上他身边的几个人干出来的。至于策划于密室亲手去抓那 55 万名右派分子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，还有义正词严地去批判那 55 万名右派分子的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人，好像都和旧时官府里的衙役一样——老爷让打板子，小的就打；老爷让打多少下，小的就打多少下。当时，中国的知识分子约有 500 万人，右派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；也就是说，整个知识界几乎都卷进去了。我敢断言，如果人们的分辨

能力略微高一点,手下略微能留一点情,绝不会抓出那么多的右派分子,也绝不会把他们整得那样惨。

反右时,我正在读小学五六年级,只有一些零碎的印象。以后,随着接触越来越多的右派分子,听到越来越多关于右派分子的故事,才渐渐明白:当年绝大多数右派分子都是响应大鸣大放的号召,发表了一些意见而被“引蛇出洞”的;有的甚至连意见都没有发表,只是为了凑数而被扣上了这顶重如泰山的帽子——

我曾听一位在东北某铁路局工作的亲戚说过,反右时,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因为没有按照上面布置的比例抓够右派分子,便在刚分配来的一批大学毕业生身上打主意;最后,看着一位从上海来的大学生戴副黑边眼镜,穿着时髦,“像”右派分子,就把他报上去凑了个数——从此,这个刚走上人生道路的青年人便厄运临头,直至被发配到内蒙古。

还有一位长者,曾给我讲述了她被打为右派分子的经过:当时,她所在学校的一位领导,为了极力表现自己工作有成绩,便“领导”着她到处看大字报,边看边启发诱导她提意见;最后,终于从她嘴里掏出了一句“农民的油不够吃”,于是乎便“大功告成”。

1997年5月,我回母校同济大学参加九十周年校庆时,听一位高年级校友说,他们班的同学这次差不多都到了,包括一位当年在班上被打为右派、毕业后又被发配到边疆的同学。这位同学当年之所以被打为右派,是因为他和一名班干部都同时追求班上一位女同学;这位班干部便以莫须有的罪名将他打为右派,从而顺利地“夺”走了那位女

同学。这次校庆,三位当事人都来了;大家虽感慨良多,却都讳言当年那段往事。

行文至此,我在浏览刚送来的一份《中国文化报》(1997.11.15)时,看到作家姜德明的一篇散文,题为《离宫外边》。这篇文章恰好讲述的就是一个右派分子的遭遇:十多年前,作者去承德时,发现有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在摆书摊,所卖的书与别的书摊不一样,没有低俗读物,而且对顾客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关心、负责。作者向当地的朋友打听后,才知道这位妇女不是本地人,1942年武汉大学图书馆专业毕业,50年代初响应支援塞外的号召来到当时的热河省,并在当地找到了一位恋人。只因她学习英语,便被周围的人怀疑上了——她为什么不学习俄语?为什么离开大城市到塞外……反右运动一来,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,先送到山区劳改了6年,后来又遣送回原籍湖北农村,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才返回承德,被安排在新华书店烧火,每月工资20元。好不容易等到问题解决了,她也该退休了,便摆了个书摊,算是与自己当年所学的图书馆专业对上了口;然而,青春一去不复返,她一直没有结婚。当本文作者最近再次到承德去寻访她时,才知道连她本人也一去不复返了!

.....

类似上述这样的故事,我听过不知道有多少了;然而,我至今还从未听说过,有哪一位当年反右的先锋,或哪一位当年反右的喽罗,能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,向当时的受害者赔礼道歉——反右扩大化的帽子扣在了毛泽东的头上,“人民”都逃逸了。

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，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受害者们在一起接受改造时，彼此之间居然还要把别人整自己的一套用到自己同类的头上。1993年出版的《中国“左”祸》一书，在介绍作家从维熙被打为右派后的经历时，有这样一段记述：

.....

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，在这样的晚餐以后，总是“改造会”，肚里的食物消化不好，还要汇报“阶级斗争新动向”。在座的都是右派，相互之间的揭发、批判是受到鼓励的，谁的表现最好，谁就能有解放的希望。所以，会场的斗争气氛绝不亚于群众斗右派的批判会。

从维熙的好友李滨声在“改造会”上被指责为为贫农画牛画瘦了，画驴是居心险恶，其他右派们都愤怒地纷纷指责：

“你资产阶级右派立场不改！”

“你面孔狞恶，装什么救世观音！”

“公社的牛膘肥肉胖，你画瘦了是心怀鬼胎！”

“你是立场问题，只说明你反动之极！”

这样的会往往延至深夜，第二天照样起早干活。

.....

然而，我至今也从未听说过，有哪一位当年曾丧失过尊

严或伤害过同类的右派分子,能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;听到的只是怨言——这笔账又记在了毛泽东的头上,某些右派分子也逃逸了。

1957年的反右刚过,接踵而来的1958年大跃进,也无异于是一场灾难。对于经历过那场灾难的中国人来说,回首往事,哑然失笑之余,又都把罪魁祸首的帽子扣在了毛泽东的头上,而不作群体反省。且不说当时在“十五年赶超英国”和“跑步进入共产主义”的口号下,许多中国人都跟着作了一场可笑的白日梦;只要看在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的口号下,那些神话般的“卫星”都是如何放出来的,便可知道人民在这场闹剧中所扮演的角色。

从1958年6月开始,在《人民日报》和一些地方报纸上,就陆续公布了一批小麦亩产的卫星:

6月18日,河南遂平,3812斤;

6月18日,河南商丘,4412斤;

6月21日,河南辉县,4535斤;

6月30日,河北安国,5103斤;

7月12日,河南西平,7320斤;

.....

按当时的生产力水平,小麦亩产能达到五六百斤就算不错的了,上述这些数字可以说是已经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。如果说,上述数字是个别人凭空捏造出来的倒也罢了,而事实上,却是一大批人处心积虑地炮制出来的。我们不妨以河南遂平的亩产3812斤为例,看一看当事者们是

如何有组织、有预谋地弄虚作假的——

河南遂平的韩楼村，为了迎合上级领导干部放卫星的愿望，把从20亩试验田收割的麦子愣说成是从2.9亩试验田里打出来的，先召开群众大会就试验田的高产措施等事项统一口径，然后请来新华社河南分社的记者和上级领导，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打麦、过秤，共计10210.9斤，平均亩产3521斤；后来，又经过复打，于是乎亩产3812斤的卫星就放出来了。先是中共中央农工部和国家农业部联合发来贺电，接着，《人民日报》、《河南日报》以头版头条新闻和套红号外发布了这一消息。一时参观者蜂拥而至，最多时一天接待三万多人，竟喝干了韩楼村的井水。村干部们厚着脸皮不厌其烦地向参观者们讲解高产措施，包括“用狗肉汤浇地”这种类似天方夜谭式的神话。这年12月，韩楼村的一名主要领导干部被请到北京，出席了全国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代表大会，并受到毛泽东等人的接见。村里一位曾在小麦高产问题上因“严重右倾保守思想”受到大会批判的农民，这时也豁然“觉悟”了，并现身说法地自编自演了下面这段快板：

我的心中有块病，
存在肚里一春冬。
小麦高产我想不通，
病根就是我的老右倾。
通过教育我思想明，
改正错误我见行动。

老汉今年我六十八岁整，
没见过麦子长恁凶。
麦秆粗，麦穗重，
这头推着那头动。
人人讲，个个夸，
亩产小麦三千八。
共产党，会当家，
我老汉心里乐开了花。

读了这位农民的快板诗，我不由得想起那个“疯子国”的故事：有一个国家的人民喝了“疯泉”的水后，都疯了。一个明白人到了疯子国后，那些疯子反而都说他不正常。后来，他也被强迫喝了“疯泉”的水，成了疯子，于是乎大家都说他正常了——这位农民不久就被大家评为“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”。

河南遂平小麦亩产放卫星的闹剧，可谓是演得有声有色、有头有尾。至于紧接着的那些亩产四五千斤，乃至七千多斤的卫星都是如何放出来的；还有那些早稻亩产数千斤（实际当年的平均亩产才四五百斤），乃至上万斤的卫星又都是如何放出来的，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。据说，河南西平放小麦亩产 7320 斤卫星的公社的党委书记，曾被北京某高级理论刊物请去给科学界作过报告，而且，报告还被刊登在《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》上。

《人民日报》当年 9 月 1 日还有过这样一则报道：河北徐水的大寺各庄人民公社计划放个“一棵白菜 500 斤、皮棉